

中国的“海龟”正在变成“海带”吗？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

崔大伟、杜在超

崔大伟 (David Zweig): 香港科技大学名誉教授, 跨国中国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电子邮件: sozweig@ust.hk (URL: drdavidzweig.com)

杜在超: 中国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

电子邮件: zaichaodu@fudan.edu.cn

“反向移民”的分析人士强调, 拥有外国博士学位的人才非常重要, 他们从事能够增强国家实力的前沿研究。但是, 数百万出国短期攻读硕士学位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与由国家资助的中国海外学生相比, 自费硕士生 (MAs) 普遍被认为能力较差。拥有高级学位的归国人员被称为“海归”或“海龟”, 而从“海外”回来“等待”就业的人在 2005 年首次被称为“海带”。光荣的“海龟”是否正在演变成不光彩的“海带”? “自费硕士生的饱和率”等于回国自费硕士生的数量除以回国自费硕士生的数量与国内自费硕士生的数量之和, 这个数字的增长表明, 这样的变化过程可能正在发生。2011 年, 自费硕士生的饱和率为 27.2%; 2012 年跃升至 36%, 到 2017 年达到 45%, 480 900 名回国的研究生与 578 045 名本地毕业生一起进入就业市场。即使这些年轻人由于政治和新冠疫情造成的不友好环境而远离美国, 但他们在反向移民中的份额仍然相当高。

自 2005 年以来, 自费硕士生的反向流动让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和记者们质疑: 中国是否正在产生过剩的“海带”, 以填补国

内不满的工薪阶层或失业者的行列。尽管如此, 在 2007 年的一篇论文中, 韩东林 (中国人民大学) 和崔大伟认为对“海带”的担忧被夸大了, 70% 的海归在三个月内找到了工作, 而 90% 的海归在六个月内找到了工作。我们还发现, 与本地毕业生相比, 他们有很大的“工资溢价”。

本文的分析借鉴了几项相关研究的结果而得: (1) 其中有三项研究是 2006 年由教育部发起的, 得到了来自日本、加拿大和中国香港等地区海归的反馈; (2) 崔大伟在 2006 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 将地方自治市本地毕业的学生与上述提到的海归硕士生进行了比较; (3) 某海归单身交友网站 2016 年一项调查得出了进一步的数据集; (4) 全球化智库 (Center on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与智联招聘与 2016 年联合发布的问卷, 收回了 1 589 份有用回复; (5) 西南财经大学于 2015 年开展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其中杜在超等人将 482 名本地培训的研究生和 482 名归国研究生进行配对, 将背景相似的学生进行对比。

为什么学生会回来：“推”、“拉”力还是家庭的作用？

为了评估学生归国的原因，崔大伟通过用于分析人才流失的“推—拉力”视角，逐个分析了“失败”/从西方被“推出”、或是被机遇“拉”回家的因素是否影响了学生归国。崔大伟的分析还包括了“回归家庭”的选择，从而分析这三组因素所产生的七种结果，包括：(1) 求职的长度；(2) 工作满意度；(3) 回国后生活满意度；(4) 海外收益和成本的比较研究；(5) 收回教育投入所需时间；(6) 实际收入；(7) 预估收入。

智联招聘 2016 年的调查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积极的一面是，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水平的情况下，那些被“拉”回来的人找工作花的时间更少，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更高，认为出国的好处大于付出的成本，收入也更高。那些被从海外“赶出去”、被迫回国的人，面临的困难只是“收回成本”。然而，那些为了“家庭”而回国的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找到工作，并弥补出国的成本，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满意度”方面的得分为负。因此，在这个强烈以家庭为导向的文化中，给年轻人的信息是“不要因为去满足你的父母而选择回国，否则你会很痛苦。”

智联招聘 2016 年的数据还描绘了两类海归：一类是成功的海归，因为他们了解国内市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并具有就业市场所需技能；另一类海归出国留学是因为他们之前无法进入一所好的中国大学求学，他们忽视了国内就业市场的需求，没有进行良好的职业规划从而在留学时选择了

错误的专业。这些被“推”回中国的中等学生，回国后注定只能从事一般的职业。在中国，尽管他们花很长时间求职，但他们仍然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不满意，很容易变成“海带”。

留学是否会增加海归们的收入？

2006 年海归们的工资产生了显著的工资溢价。将来自日本、中国香港和加拿大的海归与中国各地 6 000 名城市居民的收入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海归硕士的收入比同等学历的本地居民高出 83%。

然而，父母的社会阶层可能会盖过留学带来的收入增长。为什么这样说呢？2016 年“海归之信”调查的回归模型发现，海外学历显著增加了海归的收入。然而，当我们将家庭收入、父母是否曾为官员的因素引入模型时，出国留学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反，家庭收入和父母是否是官员变得重要起来。因此，虽然出国能让很多年轻人受益，但不一定能帮助到来自精英阶层家庭的孩子们。

杜若甫和他在西南财经大学的同事分析了 2014 年的调查，由于他们的“配对”分析，结果更加明确。调查结果显示，在显著性水平为 0.05 水平的情况下，具有研究生学历的海归比同等学历的本地毕业生收入高出 19.3%，而本科学历的海归与本地毕业生之间没有收入差异。他们还测试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效应和“信号效应”（signalling effect），前者表示海归因为能力而获得更高的薪水，后者表示雇主仅仅因为海归有过海外留学经历就支付他们更高的薪

水。他们发现，海归在公司工作的时间越长，与本地毕业生的工资差距就越大，这表明出国留学有回报，因为只有当雇主发现海归的工作效率更高时，海归才会获得更高的工资。

在中国发展并维护跨国关系时，外国人应该感到欣慰的是，与他们交流的年轻专业人士——无论是在外国公司、国内公司、非政府组织、大学还是政府部门——很可能都受过海外教育。这群有才能的人，虽然被称

为“海带”，但正是这些人，将使中国保持其作为“发展中世界”杰出成员的领导地位，并将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中国的崛起及其与全球体系的更深层次融合作出贡献。

注：崔大伟感谢西南财经大学的孙玉婷和赵国昌以及复旦大学的杜在超，邀请他参与他们的项目。他们的联合论文即将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上发表。